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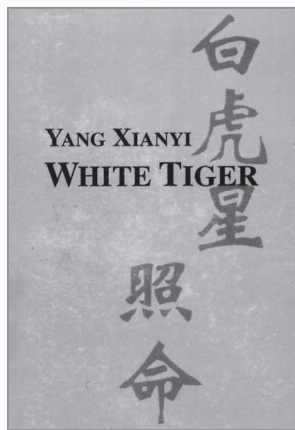


# 橋上的行吟者

文字工作者

蔡 登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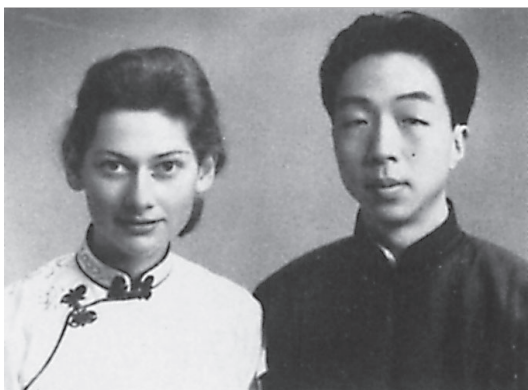
人們常把傑出的翻譯家，比喻為架設國際文化交流橋樑的工程師，然而精湛的翻譯不只是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而已，它更需要有深厚的文化修養為背景。因為如果沒有廣博的歷史、文化、社會的知識，又如何能精準完美地轉換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語系的另一國度。而他得益於從小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系統學習，得益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甚至還得益於他的性情。於是他有足夠的能力架設起美麗的橋樑，然後他從東方走到西方，又從西方走到東方。他不僅將中國名著譯成英文，還將英國、法國、古希臘的名著譯成中文。他在橋上行走、吟誦，是那麼地出色，是那麼地成就卓著。他就是楊憲益。



楊憲益在1990年2月以英文撰寫自傳《WHITE TIGER》（原名《白虎星照命》，2001年4月由薛鴻時譯成中文出版，更名《漏船載酒憶當年》），在開宗明義就說：「我出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日，按陰曆推算，是甲寅年（虎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母親日後告訴我，她生我之前做了一個夢，夢見一隻白虎躍入懷中。算命先生說，這既是個吉兆又是個凶兆；這個男孩長大後不會

有同胞兄弟，他的出世還會危及他父親的健康；然而，他在經歷重重磨難和危險之後，將會成就輝煌的事業。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業是否算得上輝煌，但是我確實是母親唯一的男孩，而且我五歲時父親就病逝了。在過去七十餘年生涯中，我確實經歷了重重磨難。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儘可以說他的推算大致不差。」楊憲益祖籍安徽泗縣，但出生在天津一個富裕家庭。父親曾任天津電話局兼電報局局長，後又任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他從小沒進過幼稚園及小學，而是請家庭塾師教導的。12、13歲時才進天津法租界內的英國教會學校—天津新學書院（TACC）。先上了1年預科，然後是6年正規教育，共7年。到1934年畢業了，原本要進清華或北大，但卻因他學校的英國教師C. H. B 朗曼，要休假回英國，帶他同去，於是他到了倫敦，經過5個月的苦讀希臘文和拉丁文後，在次年的春天，他參加牛津大學的入學考試。楊憲益回憶道：「那年頭，一個亞洲或非洲學生想要進牛津，很難。他們的機會僅僅是競爭在某個學院裡的一兩個名額而已。錄取我的那個學院叫默頓學院，它是牛津大學諸學院中歷史最悠久的學院之一，不過，它也許沒有基督堂學院、巴里奧學院和莫德琳學院那麼出名。」他雖然輕鬆地通過筆試，但在面試時主考官要他再多學一點希臘文和拉丁文而延遲一年入學。

在這期間他已熟悉牛津大學裡那個小小的中國學生團體，在那團體人數不滿一打。其



· 1941年楊憲益與戴乃迭攝於重慶

中有歷史學家向達，他是來研究中國敦煌洞窟發現的古代手抄本文獻（寫本卷子）的。而呂叔湘也正在這裡攻讀語言學，而楊人梗則在研究法國大革命史，錢鍾書與妻子楊絳也在這裡攻讀 B. Litt 學位。楊憲益在進牛津後，就被推選為中國學會的秘書，次年則被選為主席，這個職務一直擔任到他離開牛津為止。而在 1937 年他由於同班同學伯納德（伯尼）·梅洛的介紹認識了 Gladys（戴乃迭）。戴乃迭的父親 J. B. Tayler（中文名字叫戴樂仁）受倫敦傳教會派遣來到中國，曾在天津新學書院任教，後又到燕京大學教書，戴乃迭就是在 1919 年生於北京的，而在她 7 歲時，母親把她和姐姐帶回英國。中學畢業後，她獲得獎學金在 1937 年來到牛津大學攻讀法文。由於她童年對中國的美好印象，使得她參加了中國學會，並擔任學會的秘書，而這時候學會的主席是楊憲益。「儘管當時伯尼·梅洛正在熱烈地追求乃迭，我們班上許多同學也都以為她是伯尼的女友，但實際上她更喜歡的是我，不是伯尼，而我自己已經愛上了她。有一天，我和她互相傾吐了彼此的感情，當天晚上，我覺得我必須把這件事告訴伯尼。他顯然非常傷心，在那一年剩下的日子裡，他盡量避免和我倆在一起。後來乃迭和我決定訂婚，我在校園內的宿舍裡舉行了一次早餐會，我在會上宣佈了我們訂婚的消息，那天我的許多年輕的英國朋友都應邀出席了。我也曾向伯尼發出邀請，但

他沒有來，我再也沒有見到他。……後來他成為香港大學的註冊主任。……他也結婚了，娶的是一位很好的瑞士姑娘，名叫莫麗塞特……，1983 和 1984 年，我和伯尼分別多年後，終於在英國重新聚首。」，楊憲益深情地回憶著往事。而在當年他們雙雙放棄了法國文學，楊憲益改學英國文學，戴乃迭則改學中國文學，當時牛津大學剛開始設置中國文學榮譽學位，戴乃迭成為獲得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第一人，而同時楊憲益也獲得英國文學榮譽學位和碩士學位。

1940 年楊憲益偕夫人戴乃迭返國後，先後在重慶中央大學柏溪分校、貴陽師範學院、成都光華大學任教，1943 年到 1951 年則任重慶及南京國立編譯館編纂。1953 年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部專家，又兼為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譯稿。1979 年任《中國文學》副主編，次年升任主編。楊憲益和戴乃迭從四〇年代起就長達半個世紀的翻譯合作事業。在任職重慶北培國立編譯館時，館裡翻譯委員會主任梁實秋，在讀了楊憲益的《離騷》這篇長詩的英譯稿（楊憲益在牛津時翻譯的），發現楊憲益乃「譯界不可多得之人才」，於是聘請他擔任《資治通鑒》的翻譯工程。梁實秋在談到這部書的翻譯時說：「其文字固不少困難，但所牽涉到的典章文物有時亦甚難理解，而譯者非理解透徹即不能下筆。楊先生夫婦黽勉從事，到抗戰勝利時約成三分之一，實在是一大盛舉。」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初，是楊憲益與戴乃迭翻譯成果的第一個高峰期。他們主要的譯作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英譯，有趙樹理的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丁玲的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魯迅的《故事新編》，張天翼的小說《大林和小林》、《寶葫蘆的秘密》，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郭沫若的話劇《屈原》，樣板戲《白毛女》；其中最重要的是 1956 年至 1959 年陸續出版英譯 4 卷本的《魯迅作品選》。二是，英譯中國傳統戲



曲的各種劇本，分別有明代洪昇的《長生殿》、元代的《關漢卿雜劇選》，近代的京劇《打漁殺家》、《白蛇傳》、《望江亭》，川劇的《柳陰記》、《拉郎配》，崑劇的《十五貫》，評劇的《秦香蓮》，晉劇的《打金枝》，閩劇的《煉印》，粵劇的《搜書院》等。三是英譯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有《龍女：唐代傳奇十種》、《中國古代寓言》、《宋明評話小說選》、《漢魏六朝小說選》、《不怕鬼的故事》（六朝至清代的志怪小說）、《儒林外史》等。四是，有關楚辭及古代文論及文學史的英譯，有《離騷及屈原的其它詩作》、《中國古典文學簡史》（馮沅君、陸侃如著）的英譯、《中國小說史略》（魯迅著）的英譯，還有《文心雕龍》的英譯（節選〈神思〉、〈風骨〉、〈情采〉、〈誇飾〉、〈知音〉）。

而到七〇年代他們又有一部分經典作品的譯本出版，分別是戴乃迭和英國翻譯家 W.J. F. Jenner 合譯的《當代中國小說選》，戴乃迭譯的魯迅代表作《阿 Q 正傳》，戴乃迭譯的魯迅作品選—《無聲的中國》，楊、戴兩人合譯的魯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以及司馬遷的《史記》選本。當然這期間最受矚目的譯作，是 1978 年至 1980 年出版的 120 回《紅樓夢》的全譯本。八〇年代後，他們又合譯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彷徨》；還有《聊齋選》、《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的節譯；《詩經選》、《漢魏六朝詩文選》、《唐宋詩文選》、《明清詩文選》等古典詩文的英譯。這期間最重要的是由楊憲益發起並主持的「熊貓叢書」的編譯工作，該叢書以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為主要譯介對象，收有楊憲益與 Robert C. Friend 合譯的艾青的《黑鰻》；戴乃迭譯的沈從文的《邊城及其它》、《湘行散記》，孫犁的《風雲初記》，李廣田的《李廣田散文選》，古華的《芙蓉鎮》，新鳳霞的《新鳳霞回憶錄》，及《三〇年代短篇小說選》等。而叢書之外，戴乃迭還譯有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如

諶容的《人到中年》，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等。在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楊憲益與戴乃迭兩人可說是功不可沒，尤其是戴乃迭對當代作家作品的譯介更是不遺餘力。

楊憲益說：「乃迭比我勤奮，她自己單獨譯了不少中國近現代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短篇故事。不幸的是，我們只是被雇傭的譯手，選題是由年輕的中國編者負責的，他們的中國文學功力不深，還要迎合當時的政治口味。許多作品簡直浪費我們翻譯者所付出的勞動和精力，因此我常常只譯古典名篇。不過，甚至於古典作品的選擇，有時也要考慮政治內涵。我們常為此同編輯爭執，在長久辯論後才能達成妥協。」再加上「他本來能駕馭幾國文字，也是為數不多的能直接從希臘文譯成中文的學者之一。」因此經他譯成中文的，有古希臘《阿里斯多芬喜劇兩種》、荷馬史詩《奧德修紀》、古羅馬維吉爾的《牧歌》、《古羅馬喜劇三種》、《古羅馬戲劇選》，還有中古法國史詩《羅蘭之歌》、蕭伯納戲劇《皮格馬利翁》、《凱撒與克里奧佩特拉》、《賣花女》等。

在兩人如此眾多的譯作中，最受海內外學者與讀者矚目的，首推《紅樓夢》全譯本。截至目前為止，《紅樓夢》雖已被譯成 23 文字，共有 60 餘種譯本；但英文的全譯本只有英國學者戴維霍克斯與約翰明福德的 5 卷本《石頭記》（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楊憲益、戴乃迭合譯的 3 卷本《紅樓夢》（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兩種（注 1）。

（雖然早在 1929 年中國學者王際真教授已英譯《紅樓夢》在美國出版，但可惜的只是節譯本。）其中英國學者的譯本因理解失誤造成錯譯、漏譯較多，尤其是原書第二十八回到第五十三回中，學者張弘就指出「由於這一部分以相當多的篇幅寫到了結詩社、品戲文、集聯句等內容，考慮到缺少中國古典文學知識的英國讀者對此只有困惑，霍克斯的譯本作了少量刪節，另以註釋形式加以標



明」(注2)。而楊譯本在這方面的處理則要好得多，對原著中的詩詞、聯額保持最大程度的完整，用準確簡練的譯文盡量將原文的表層與深層含義盡數表達出來。而學者李露更指出(注3)，《紅樓夢》中的漢語習語(成語、俗語、諺語、歇後語)，這些和民族的歷史背景、經濟生活、風俗習慣、地理環境、心理狀態與生活經驗習語相關的文化特色，在為另一種語言所不具備的不同表達手段和形式時，楊憲益首先考慮採用等效對譯法，當然要找到英文中本體、喻體、寓意、形象上完全吻合的習語是極其有限的，因此用形象借代的手段，套用英語習語的形式，最大程度地保留原語中的語義內容，是他的變相做法。其次對於比喻明顯的習語則採用完全直譯法，它不會造成讀者在理解和接受上的困難，而且在形式、內容上與原作相對應，較完整、準確地傳遞了原作的信息，再其次則採取部分直譯法，即總體把握此習語的思想內涵，將隱含意義準確表達，有時甚至更換形象或放棄形象。而在前三種都無法準確表達原文中的信息內涵時，最後則採用意譯法。他們這種方法用之於《紅樓夢》，也用之於魯迅的《阿Q正傳》等之翻譯上。總之，他們選用與原語詞彙最等值的表達方式，與原文最相近的結構，在形式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做到了形似；在意蘊上準確地傳達了原作的內容和風格，譯出了原作的神韻與意境，而達到了形神兼備的地步。

楊憲益與戴乃迭一起走過快樂與痛苦。在牛津大學時戴乃迭沒想到自己會嫁給這位中國留學生，也沒想到她會與楊憲益，盡畢生之力將中國從先秦到當代的百餘種名著譯成英文。在戴乃迭眼中，當年的楊憲益的確與眾不同。他懶散、貪玩、調皮，似乎諸事漫不經心；但卻又絕頂聰明，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她接觸的留學生中，只有他最具備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因此在晚年戴乃迭曾在朋友面前開玩笑說，她愛的不是楊憲益而

是中國傳統文化。雖是玩笑話，但也說明在戴乃迭眼裡，兩者之間是一個完美的結合。而在相濡以沫將近60年後的1999年11月22日，戴乃迭因病去世。楊憲益寫下了一首緬懷詩云：「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朋友將它寫好裱好，掛在楊憲益新居的客廳裡，他與它朝夕相對，如晤愛妻。

著名學者錢鍾書曾認為，翻譯乃是「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那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裡，這是很艱辛的歷程」，真可謂道盡了翻譯者的心聲。誠然，翻譯是促進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與心靈溝通的紐帶，又是一項十分複雜、艱巨的心智工作。它關係到不同語言形式及不同社會、歷史、文化、思想、審美信息的轉換表達，也因此翻譯家提出了諸如信、達、雅；神似、形似、直譯、意譯等等理論與做法，但就楊、戴兩人的看法，翻譯不僅要忠於內容，而且要忠於形式。在晚近的翻譯史上，由西書中譯者可說相當多，單就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有朱生豪、梁實秋、孫大雨、卞之琳等等名家卓越的譯品，但若就中書西譯方面就顯得貧乏許多，但後者的意義顯得更來得重要些，它是一種文化的輸出工作。而要能擔當此重任者，其中西文化的根抵要極其深厚，而非只是語言能力足夠就行，因此辜鴻銘被認為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後，也僅有林語堂可當之。辜鴻銘這位滿清遺老在1928年風雨飄搖中死去，他的辯子、他的守舊，逐漸為人所淡忘；但他所譯的《論語》、《中庸》被介紹到西方去，再加上他的西文著作，曾引起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及舉世公認的文評家勃蘭兌斯(Brands)的重視。而林語堂更是沒有接受魯迅的建議去翻譯一些英國名著，他懷抱著「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雄心壯志，他曾



想把《紅樓夢》譯成英文，（案：1973年11月林語堂完成《紅樓夢》節譯本，惜未能出版，1984年有日本佐藤亮一根據林語堂的英譯本譯成日譯本。）（注4）但後來考慮再三，覺得它距離現實太遠，因此他借鑑了《紅樓夢》的藝術形式，用英文寫出了長篇小說《京華煙雲》，它曾是諾貝爾文學獎候選的作品。而之後他又以英文出版了《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和《英譯莊子》，全面向外國人介紹儒家及老莊的思想，在在引起國際上的關注。

因此楊、戴兩人的中書英譯就顯得相當重要，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翻譯，學者認為主要靠北京外文出版社的《熊貓叢書》及香港中文大學的翻譯小組。而晚近中華民國筆會（The Chinese PEN）在齊邦媛、彭鏡禧等教授的努力下也做出了相當的成績，諸多現、當代的小說都已被譯成英文在國外出版。而最近還有王德威教授主持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當代小說西譯工作和張錯教授主持的選譯陳義芝、焦桐、許悔之、席慕蓉、張錯五位現代詩人的作品。通過翻譯這媒介，讓中國的文化在國際上獲得更廣大的交流。我們曾有過

一流的文學作品，但因沒有一流的譯筆，就談不上角逐國際文學獎項，而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的精湛譯品，可說是將高行健推向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大功臣，雖然不朽的作品從不需桂冠來肯定，但能因此獲得國際上更多的交流與瞭解，當是更為重要的，而這正是溝通中西橋樑的譯者莫大的成就。我們深切地期盼著！

###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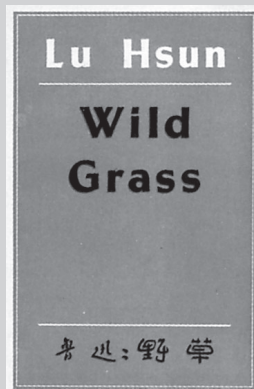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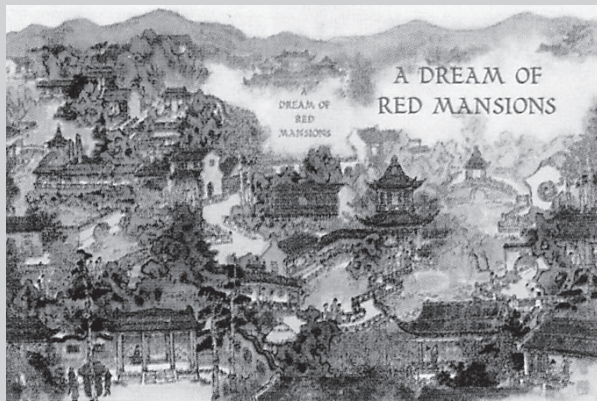
注1.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由英國 Penguin Books Ltd. 出版。分1973年、1977年、1980年、1982年、1986年，5次出齊。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80年3卷本出齊。

注2. 張弘著《中國文學在英國》，花城出版社，1992。

注3. 李露〈傳情達意，巧奪天工——試論楊憲益《紅樓夢》譯作中漢語習語翻譯的原則和方法〉，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年6月。

注4. 劉廣定〈林語堂的英譯紅樓夢〉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年12月。



· 楊憲益譯作《野草》、《紅樓夢》之書影。